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报道》

新改革 新梦想

编者按: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威胁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社会稳定。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勾勒改革路线图。随着会期的临近,舆论分析预测全会内容的热情也

日益高涨。这次会议将讨论哪些方面的改革、会出台哪些重大决策、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本报就国企改革、民营经济、涉外经济制度、金融改革等几个热点话题,走访了业内专家,听取了各方声音,以表达我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与希望。

明确主业 分类监管 重焕国企活力



■ 本报记者 王哲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国企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的公开讲话基本透露了国企改革的未来路径。记者了解到,国企改革的目标或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进和退”的问题,要明确央企及国企在哪些领域有所进退,特别是要加快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二是企业自身改革,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及推进董事会建设等;三是建立适应市场化的企业运行机制;四是解决央企和国企的历史遗留问题。

政企分开是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的重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90年代政府对国企的要求。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国企制度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研究新的改革方向已成当务之急。

对于国企改革,国资委给出的方向是: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要求,推动企业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组、项目投资等方面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黄淑和还表示,要根据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规范的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加快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

的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研究界定监管企业的功能定位,深入探索分类监管的途径和方式,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分拆央企或成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有报道称:“国企分类监管的核心将是厘清同一企业中的政策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涉及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的分拆。”

“拆分央企在技术上容易,但操作困难。”财经评论人士唐萧对记者表示,“首先,人们对国企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褒贬不一。其次,如何拆分核心业务和非核心资产难统一。再次,国企涉及了中国的大行小业,从哪些行业入手需谨慎选择。”多位人士对记者表示,国企分类监管等将成为重点改革内容,其中,国企不同业务的厘清是焦点与难点。

对于可拆分的领域,业内人士建议可以从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行业做起。国企改革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石油、电网、铁路等领域的国企应该聚焦主营业务,如油气采集业务可以垄断,管道业务和终端的加油站其实可以放开;铁路的投资、建设、运营可以拆分;电网的输电和配电应该分开。“如果基础部门和行业的利润上去了,实际上提高的是全社会的运营成本,带来的负效应将大于国企得到的利润。”

“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应是建立契约制度,而不是沿袭旧路再打银行、股市、债券的主意,股市已经够‘熊’了。”这是财经评论家叶檀对国企改革的期望。

据了解,国企改革以往沿袭的是“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减负”模式,但是,剥离不良资产、优质资产上市进而整体上市,很可能滋生出劣质资产、熊市股价的现象。

“由于国企改革涉及到金融政策、土地政策、财务政策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非常大。”证券分析师陈明对记者表示,由于国企在股市的权重很大,这加大了国企和股市的裙带关系。

“消除公司等级制度,搞活国企体制和现有机制,更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某国企的一位中层管理者向记者表达了他对国企改革的期盼。

民企参股分羹 打破市场垄断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称,正在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国资委下一步将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组、项目投资等方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地方人大代表刘光平和非常小器公司总裁梁伯强有话说。

记者:截至10月21日,苏宁、国美、京东等8家民营企业与电信运营商签订了转售业务合作协议。这些民营企业将从电信运营商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后销售给最终用户。您对此如何解读?

刘光平: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这已经是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对于民企而言,这释放出了一种合作模式的信号,同时也表明政府对民营企业充分重视。只有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一些重要领域,比如电信、能源等才能向民间资本进一步开放,使其形成示范效应,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梁伯强:迈向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此次开放的项目是一般民企很难企及国企的项目,这说明垄断行业的又一块坚冰正在被打破。除了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之外,消费者或许很快将有更多选择。若能合作,这将为民企进入电信领域提供途径,也可扩展民企投资渠道。但国企与民企合营不是最好的模式,在公平的环境里独立竞争更有成效。

记者:尽管取消了投资门槛,但民营资本想要参

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还存在诸多现实障碍。您认为民营企业要凭借资本获得话语权,切入口在哪里?

刘光平: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先行。很多垄断行业难以进入,并不完全是因为门槛高,国企的强势不是靠门槛而是靠资源垄断,是靠政策支持才形成的竞争优势。所以,要让国企与民企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这是重中之重。民营企业要凭借资本获得话语权,其切入口有3个:首先,技术切入,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有核心技术,就有竞争力;其次,市场切入,完善的或者是差异化的销售渠道都具有竞争优势;最后,强强联合,民营企业是弱势群体,但如果抱团,就将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与国企竞争。

梁伯强: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参股到重要领域是一个大趋势,这其中,政策导向将起到很大作用。民间资本是否进场,关键还要看项目的含金量。只要政策放开,就会有大量民营企业进入。但消费者已经习惯于依赖国有企业,比如在国有银行存钱更安全等,民营企业要打破垄断并获得话语权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

记者:对于打破垄断,民营企业有何担心及建议?如何做才能见成效?

梁伯强:民营企业最关心的是其合法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只有真正维护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才能使鼓励民资的多项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就目前状况看,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弱小,民营企业的弱势资本进入国有大行业,成效不会立竿见影,其结果难以预料。

刘光平:民营企业主要的担心包括:保障机制有名无实。从以往经验看,表面上的垄断打破了,但新的潜规则又会马上形成;老虎打掉了,狼又来了,外资涌入后又将形成新的垄断主体。因此,建议出台相关政策。而政策的出台重在推进,银行贷款、设备租赁、技术改造等一系列的相关配套细则必须跟上,才有望打破垄断。建议引导国企调整产业布局,把一般性竞争行业的发展空间留给民间投资主体,防范国企过度扩张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母公司直接与民间资本合作,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这样的案例凤毛麟角。因此,建议国企与民企合作多元化、常态化。

促金融改革 兴实体经济



■ 本报记者 徐森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尽管M1、M2增长较快,人民币新增信贷增速稳定,但做实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依然融资乏力。究其原因,是虚拟经济的“挤出效应”在作祟。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议题中,金融改革将是重头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张莱楠提出,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将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她看来,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是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

“2011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及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特别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普遍出现融资压力,影子银行泛滥,地方融资平台过度膨胀。但其实,这些都是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如房地产等行业,或者是‘金融空转’所导致的。而实体经济所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特别是中小企业信贷方面的压力持续增大。”张莱楠向记者解释说,“业界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金融热、实体冷’的问题,具体体现就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

近些年,但凡中国金融业“高烧感冒”,大多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以及实体经济的“被迫边缘化”密切相关,而“第一把火”就烧在被称为中国“草根企业家”故乡的温州。2011年下半年,一场温州老板的“跑路潮”将民间借贷危机演绎到公众眼前,这也直接促成了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在2012年3月28日落地温州。

但时至今日,温州经济并没有明显回暖的迹象。参考浙江省官方此前公布的2012年16个主要经济指标,温州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其中,人均GDP、GDP增幅、规上企业(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等9项指标在浙江省垫底。这个被外界期待甚高的金融试点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差距甚大,舆论开始慢慢出现质疑的声音。

如果不能遏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就会缺乏创新动力,只能在“价格战”中作茧自缚。同时,这种“挤出效应”还会诱导更多的企业家退出实业,奔向虚拟经济,继续增加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早已有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失落的十年”的前车之鉴,中国自然不能重蹈覆辙。

显然,改革仍要继续,对象不仅仅是温州一地,而是中国金融业。虚拟经济过热导致的恶性循环是中国金融无法承受之重,更大的手术要从病根上做起。

对此,张莱楠认为,要让金融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控制金融系统顺周期性、控制信用的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与此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另一方面,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

具体到环节,张莱楠认为,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也是应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应该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而转向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更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

自贸区先行先试 涉外经济改革解困



■ 本报记者 徐森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了其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后,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已清晰可见,其中关于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更是引发业界深思。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但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时期,中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明显的瓶颈,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研究员隆国强看来,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要想顺利推进,就必须找准突破口。

建立自贸区,就是那个突破口。

根据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成长理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到TPP谈判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借助自贸区这一窗口,中国有望获得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

自由化的机会,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举行挂牌仪式。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致辞中强调,上海自贸区“重在制度创新,重在改革开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记者表示,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背景下,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着力发展外贸,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就是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进行多年,每经过一个阶段,都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建立深圳特区,到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再到加入WTO,中国每一个阶段的改革对今后几年的对外开放都起到了推动和带动作用。而随着每轮改革红利下发完毕,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在迈上了新台阶的同时,也在期待新一轮的红利。”白明表示,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整个外向型经济“上台阶”的标志,是一个大幅度的开放。自贸区本身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它不是躲在角落自拉自唱的“个人秀”,而是具备可推广、可复制特点的示范区。

白明同时指出,自贸区的示范作用不容小觑,但在全国各地的推进工作也不能操之过急。“其他地区学习要循序渐进。之所以要在上海一地开放自贸区,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让自贸区落地生花,是因为上海经济基础、外贸基础好,同时,开放的幅度也不会太大,能够作为试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让后来者少走弯路。其他地区可以学习上海自贸区,但应该有一个时间差,使问题出现后能够有寻找解决方案的运行周期。自贸区的借鉴方式应该是一揽子借鉴,并不一定要全盘照搬,学习一两处先进经验,建立综合保税区、经济开发区等也未尝不可。同时,各地也有自身不同的特点,还应该因地制宜。”他说。